当代中国对外关系  
**Contemporary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授课教师**肖佳灵 副教授（[jlxiao@fudan.edu.cn](mailto:jlxiao@fudan.edu.cn)）

**助教**施欣怡（[23110170016@m.fudan.edu.cn](mailto:23110170016@m.fudan.edu.cn)）

李昱蓉 （[23210170014@m.fudan.edu.cn](mailto:23210170014@m.fudan.edu.cn)）

张馨月（[zhangxinyue@fudan.edu.cn](mailto:zhangxinyue@fudan.edu.cn)）

**目录**

[第一讲 绪论：当代中国外交的海外研究学术背景 2](#_Toc191305622)

[一、美国学派（U.S. School） 2](#_Toc191305623)

[（一）1949年至1960年代下半叶的美国学派 2](#_Toc191305624)

[（二）1960年代下半叶至1970年代的美国学派 3](#_Toc191305625)

[（三）1980年代的美国学派 3](#_Toc191305626)

[（四）1990年代之后的美国学派 3](#_Toc191305627)

[二、欧洲学派（European School） 4](#_Toc191305628)

[第二讲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概述 4](#_Toc191305629)

[一、关于外交、外交思想的定义 4](#_Toc191305630)

[（一）外交 5](#_Toc191305631)

[（二）外交思想 5](#_Toc191305632)

[二、中国外交思想史的时期划分 5](#_Toc191305633)

[（一）古代外交思想 5](#_Toc191305634)

[（二）近代外交思想 5](#_Toc191305635)

[（三）当代外交思想 6](#_Toc191305636)

[三、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6](#_Toc191305637)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世界观和外交观——理论源泉与理想主义 6](#_Toc191305638)

[（二）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和理论——批判吸收与现实主义 8](#_Toc191305639)

[（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潜移默化与实用主义 9](#_Toc191305640)

[（四）“理论合力” 12](#_Toc191305641)

第一讲 绪论：当代中国外交的海外研究学术背景

2025.2.17

海外的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目前主要有美国学派、欧洲学派与日本学派。

一、美国学派（U.S. School）

美国学派自1949年起步，发展到当代，已经成为了最主要与盛行的研究流派。不同时期，美国的研究路径（主流学派）也有所不同，如下表：

|  |  |  |  |
| --- | --- | --- | --- |
| **时间** | **研究路径** | **代表学者** | **关注点** |
| 1949年~1960年代下半叶 | 传统/历史学派 | Fairbank | 传统的延续 |
| 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 Benjamin I. Schwartz | 个人的独特作用 |
| 现实主义学派/理性行为理论 | Allen S. Whiting | 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权力因素 |
| 1960年代下半叶~1970年代 | 中-苏-美“战略三角” | Henry Kissinger | 政治/策略互动 |
| 派系政治论 | Andrew Nathan  Robert Ross | 精英政治 |
| 1980年代 | 制度主义 | Doak Barnett  Lieberthal Okesenberg | 结构、过程、多层次 |
| 认知主义 | Gilbert Rozman  Allen S. Whiting  David Shambaugh | 认知、想象 |
| 行为主义 | / | 实证、普遍性 |

（一）1949年至1960年代下半叶的美国学派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跨过了鸭绿江。刚建立不久的中国为何要出兵？针对这个问题，当时美国的不同流派给出了不同答案：**历史学派**基于其过往经验，认为对中国外交的最基本的解释变量是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延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外交不会脱离“帝国情节”。

研究一个大国（如中国）却不考虑它的历史，尤其是其外交政策中的传统，无异于闭着眼睛飞行。

——费正清

秉持**意识形态路径**的学者则迁移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模式进行解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外交的运行准则。他们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如“人民战争”“统一战线”等，这也是中国与苏联的不同之处。此外，毛泽东的个人角色与思想（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也被考虑在内。总之，意识形态路径认为要“以中国的方式理解中国”。

**现实主义学派**将当时在西方盛行的现实主义概念（如国家力量、国家利益、国际约束等）用于对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研究之中，尤其是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危机管理之中。这一学派认为，新中国的某些对外行为是出于对外部威胁的感知从而作出的理性决策。

（二）1960年代下半叶至1970年代的美国学派

到60年代末期，在中苏交恶、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上述三种研究路径接连碰壁，于是就诞生了新的流派。

**“战略三角”流派**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与其他大国交往时的行为，强调中国与苏联、美国的三角博弈；这一流派对于中国国内政治采用了极权主义模型，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则采用了单一行为者理论。

**派系政治论**则基于当时中国领导层在外交上的可能分歧（如林彪叛逃、中美关系正常化），提出了中国高层的内部派系斗争是解释中国外交的主要因素。这一流派以“中南海综合征（Zhongnanhai Syndrome）”概括1970年代以来中国的精英政治。

（三）1980年代的美国学派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推进，更多外国学者能够来到中国大陆，之前各流派对中国外事的猜想甚至是臆测也都失去解释力了，新的流派随之崛起。

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以及中国决策体系的公开化，**制度主义**被提出，其关注中国对外政策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决策者的思维模式。制度主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决策制度与决策者。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今军事制度与战略的研究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计算机的发展使量化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变得更普遍，认知主义与行为主义随之而来。**认知主义**聚焦于与当代中国对外政策息息相关的想象和认知，从制度和个人两个角度系统分析了中式思维的深层结构及其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影响。认知主义连接了制度主义与其下的认知流派，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正式到非正式的跨越。

自1978年起，美国学派逐渐意识到无法获悉中国对外行为的全貌，**行为主义**也正是因此兴起。行为主义强调政治的结构与形式发展、政治人物崛起的环境因素。基于对实证问题的清楚定义以及对各类假说的测试，行为主义将科学的模型与方法论应用于政治学之上；行为主义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数据综合分析等方法，进行案例研究与定量研究，从而找出输入（如各类社会经济心理因素）与输出（如国家的对外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主义对当代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个假设：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已发展成为一个多领域的综合性体系。

在其发展过程中，行为主义分化出了两个极端：实证主义的极端认为，只有将其解构为可观测且可测量的单元，中国的外交才能被正确理解；普遍主义的极端则认为，必须建构起一个普遍性的、包罗万象的有关中国外交行为的理论体系。

自1970年开始的行为主义革命机械地将“科学”方法应用在社会科学上——政治与社会与自然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但其中不规则的、偶然的、存在偏差的现象却在此时被忽视了。

（四）1990年代之后的美国学派

从9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又逐步回到了文化领域。此外，**新制度主义**批判继承了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于中国要从历史、制度、文化、认知等多方面综合起来，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新制度主义秉持中庸之道，兼顾理论严谨性与实证相关性，侧重于更具政治相关性的问题，如决策机构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系统因素；新制度主义考虑国际和国内因素将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并受其影响，也考虑决策者和专家不断变化的观念；新制度主义将历史、分析、理论和预测均衡地结合起来，呼吁“国家的回归”。

来到21世纪，中国的外交成为了一门“显学”，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也形成了两个学术共同体：一个是基于大学的学者群体，他们多以历史学或政治学为背景，注重中国的历史发展，以比较的方式研究中国外交；另一个则是基于智库及基金会的群体，如哈德逊研究所、胡佛研究所、新美国安全中心等，其中多为曾在联邦政府任职的官员，虽然有较多的现实政治经验，但缺乏学术背景，较为短视，提出的理论也时常迎合当届美国政府。

总而言之，美国学派从方法、维度、议程、议题、知识体系（术语、理论）、价值引导等方面都已经成为了当下的主导流派；从美国学派中培养出的“中国问题专家”遍布世界各国高层，形成了看待中国外交的“共同话语”。

二、欧洲学派（European School）

欧洲是最早对中国外交开展研究的。欧洲对中国的早期研究集中于历史、文化、科技等方面。1948年至1950年代，汉学研究在欧洲逐渐复兴，由关注新中国国内发展的汉学家与记者主导。当时的欧洲学派基于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对外政策，加上部分的苏联影响，强调了“中国例外主义”。

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是欧洲学派的又一个时期。当时，抗美援越、文化大革命、中苏交恶三大事件，以及美国反越战、法国五月风暴两大学生运动，都促使欧洲对中国产生新的看法。当时，欧洲学派的主要流派有阶级斗争视角与功能/观念集团视角；相比于美国学派关注中国制度的威权主义，以及外交上视中国为敌对者，当时的欧洲中国研究则对中国发展的轨迹持较为同情的看法。

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在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出现了国别研究学科，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中国研究的国别和地区协会组织，如欧洲中国研究会、英国中国研究协会、北欧中国研究协会等。此外，中国研究还获得了更多的资金；企业也开始给商学院出资研究中国，为日后在中国的投资做铺垫。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更关心“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治理危机”等，但欧洲的关注点与美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欧洲学者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会持续下去，因此，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运作而不是预测它何时崩溃。欧洲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逻辑，而不是担心一个崛起的修正主义大国改变世界均势。

第二讲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概述

2025.2.24

一、关于外交、外交思想的定义

（一）外交

在学术上，“外交”总体上可以分为“大外交”和“小外交”。

“大外交”指的是外交的宏观层次，其与“内政”相对应，这是就政治学角度而言的；外交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同外界打交道时的一种政治，是一国政府针对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趋势所做出的回应。“大外交”也涵盖了外交的中观层次，其与“战争”相对应，这是就国际法角度而言的；外交指的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国家间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行为。

“小外交”则指的是外交的微观层次，即外交专业，这是就外交学角度而言的；外交是各国外交部所属专职人员和机构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

（二）外交思想

外交思想（doctrine）是决定和指导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外交原则和对外政策的思想，一般由一国领导外交的最高官员进行表述，反映在国家有关外交的文献中，也反映在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实践和国家有关人员的外交活动中。

二、中国外交思想史的时期划分

各国的外交思想有不同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体制/制度基础，这三大基础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一）古代外交思想

从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到前清，是我国的古代外交思想时期。简而言之，当时外交思想的基本架构是“家-国-天下”、内圣外王的观念。“天下”观使得中国并非追求建立单一民族、单一宗教的帝国，而是具有相当的包容性——这与同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异端”理念也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外交思想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古代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开放包容，推崇实行德治教化、以德报怨、内圣外王等治边安邦的政治理念，主张“修齐治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此建立了独特的薄来厚往的“朝贡（外交）”体系；另一方面，古代外交思想保守迂腐、封闭狭隘，轻视所谓“化外之地”。

1405年至1431年，明朝初期，郑和七下西洋；1566年，英国的德里克开始航海，此时正值明朝中期；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4年，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在1648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的这近二百年，西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并确立了民族国家体系。

（二）近代外交思想

在西方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同时，中国却依然闭关锁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的序幕。

1840年至1949年，是我国外交思想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期，也是自汉之后，中国外交思想交锋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中交织着晚清王朝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晚清政府与民国先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不同的外交思想和主张的斗争。

这一时期是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外交思想内容最丰富的时期。一批又一批时代的精英试图打破传统外交思想的束缚，一面反省和清算中国传统外交的弊端，一面提出以全新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思想，试图为中国开创一个适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外交新天地。当时，出现了魏源、冯桂芬、严复、邓演达等开明的思想家，林则徐、曾国藩、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张之洞等识时务的晚清官员，孙中山等有抱负的政治活动家，陆征祥、顾维钧、王宠惠、颜惠庆、胡适等才华横溢的职业外交官。但是，在国家性质与综合实力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弱国无外交”，他们个人的努力都没有改变中国在外交场上的处境。

（三）当代外交思想

1949年至今，是我国的当代外交思想时期。从1921年至1949年，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最早萌芽时期，中共早期的政治文献、论著、期刊等提出了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主张、原则、政策，中共早期的对外交往实践也发生于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当代外交思想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起点（或转折点）。1949年至1978年，是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外交思想；1978年至2012年，总体上可概括为邓小平时期的外交思想；2012年以来，是习近平新时代的外交思想。

三、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世界观和外交观——理论源泉与理想主义

1. 马克思列宁主义外交思想的内容

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社会给中国的定位中非常强调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事实上，在战后的国际关系中，由于冷战的原因，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或外交实践完全排斥意识形态因素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已经认识到，在国际关系领域，阶级斗争的规律明显地不同于国内斗争。因此，在一些经典著作中有大量篇幅对国际关系和外交进行详细论述，并使用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等概念。最有代表性的与国际关系相关的马列经典著作有：

* 《共产党宣言》（马恩合著1848)
* 《18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1856）
* 《资本论》（马恩合著1867、1885、1894、1910）
*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1871）
*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恩格斯1890）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1916）
* ……

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述和书信中提到了中国，他们于1853~1862年间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18篇，谴责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揭露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其中一些重要的思想后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国和指导党和国家外交实践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方法论上树立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提供了研究国际政治的范例（如1870~1871年马恩对普法战争的研究）；在观念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关于战争的科学看法、关于国家平等民族平等的观念、关于和平外交的观念、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念、关于阶级外交的观念等。

2. 马克思列宁主义外交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提摩太是最初将马克思、恩格斯、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带到中国来的人。陈望道首次将《共产党宣言》翻译至中文。自此，共产主义理想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在日后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20世纪，中国面对了三个西方。20世纪初期，中国一批有志之士前往了自由主义的欧洲，学习“德先生”“赛先生”，但1918年的巴黎和会让中国对欧洲彻底失望。后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转向了共产主义的苏联，而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等思想有所共通，因此能较好地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是，20世纪中期中苏交恶，乃至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面对的第二个西方也不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众开始对现实主义的美国产生好感，但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也打消了中国人对美国的幻想。因此，21世纪，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外交思想道路。

3.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影响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新中国外交实践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包括：

* 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 1925年12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1937年7~8月《矛盾论》《实践论》；
  + 指导革命与抗战胜利，如《论持久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
* 建立新中国：国体、政体的选择；
* 国际格局、形势判断，相应的政策调整；
* 和平发展主题；韬光养晦；人类命运共同体；
* 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支持亚非拉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维护；
* 民族独立、抗击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
* 主动承担国际义务，长期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私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援助。

消极的一面包括：

* 曾教条地强调以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来划分国家间敌友界限；
* 曾过分强调国际主义高于国家利益；
* 推迟中法建交；
* 与前南斯拉夫关系问题；
* “文革”中把“世界革命”当成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当成中国对外关系的行动纲领；
* 超越能力的对外援助；
* 拒绝西方援助等。

4.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外交思想的评价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19世纪中叶后出现的一种政治学说，具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双重功能：方法论上的社会设计功能，即实践理性，行动指南；理论上的社会启蒙功能，即认识理性，“规律-趋势”理论模式，把握本质。与现代经济学工具理性的实用性相比，马恩的经济学更具思想的认识和启蒙功能。

在剖析国际形势和指导外交战略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相当科学性。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五大洲曾经有众多的信奉者；战后，冷战意识形态对立，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被西方不断“妖魔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本论》重新成为畅销书——证明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经典的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一种理想，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才能具有生命力，要让其思想性和工具性有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演进的某些论断的确已经过时，但马列主义观察国际问题的一些辩证思想至今在指导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和外交实践时仍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列主义国家观、世界观和外交观中的一些原理，对新中国外交的指导作用，迄今仍可以说是成功大于失误。

（二）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和理论——批判吸收与现实主义

1. 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和理论的内容

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包括主权、均势、国际法等；其核心有国家利益、实力外交、地缘政治（海权、陆权、空权等）、文明冲突等。二战前，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是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各种理论，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二战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逐渐出现。现代国际关系还包括了国际法原则，如《联合国宪章》。

中国传统外交和东方社会的朝贡体系（如皇权、敕谕、城下之盟、攻守同盟）并没有西方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主权、均势和国际法概念。中国签订的第一个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条约是1689年《尼布楚条约》。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对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条约、实力等原则逐步有了深刻的理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仅使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也使主权、平等、民族主义等概念，深刻地嵌入20世纪中国政治革命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有排斥“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国际关系体系”中呈现的一些进步的外交原则和外交理念，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对它们进行“中国化”的吸收。

2. 主权

对于“主权”，西欧的经验是“一族一国一主权”；孙中山的思路是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变为“五族共和”；“中国化”的经验则是“多民族一国一主权”。

中国与西欧的经验不同，在于两者有完全不同的国际政治和族际政治历经和经验。中国有着悠久的大一统传统，强调文明凝聚力与包容性，具有较强的地缘向心力；新中国建立后，用“民族自治区”和“一国两制”等原则来确立和稳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主权。总之，中国是以自然形成的国家（country）为基础进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设。

3. 国家利益

建国初期，由于受“阶级外交”、“国际主义至上”等意识形态的束缚，为避免“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嫌疑”，更多地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外交工作中的重要性。“文革”结束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外交原则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逐步调整。

胡耀邦于1982年在中共12大报告中首次公开宣布，“民族利益”（即“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邓小平

我们都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工作的。

——江泽民

2011年，胡锦涛明确界定了“国家的核心利益”。习近平则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2011年9月7日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对国家核心利益作出清晰明确界定：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直到1971年重返联合国，中国才真正被“西方中心”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所部分接纳和部分认同。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和适应各种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的原则和规则，以融入全球体系。加入WTO后，中国学习和内化现代国际经济贸易原则，如知识产权等观念、规则、法律。 冷战终结后，中国采用了“外交新思维”，认为“国家利益”是外交服务的主要对象。后来，“民本主义”的外交理念日益受到重视和强调。

中国外交思想从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强调“国家利益”到重视“民本主义外交”的思想发展脉络，顺应了现代国家主流的外交理念发展。

美国的模式不适宜推广到法国。墨西哥抄美国宪法，但墨西哥还是墨西哥，拿破仑曾经向西班牙推广法国的宪法，西班牙还是西班牙。

——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

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2015年9月25日与奥巴马会晤时

（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潜移默化与实用主义

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

——费正清

任何国家都不能否定或摆脱其传统的政治文化对现实外交理念、外交风格等的影响：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政治文化对欧美各国外交思想的影响，儒家文化、佛教、神道、印度教等对亚洲各国外交思想的影响，伊斯兰文化对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外交思想的影响，都不容忽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绵延至今，博大精深，其中既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也包含了高超的治国艺术和外交艺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更突出地表现在对腐朽的、落后的“封建”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的反叛和决裂。几代领导人既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或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饱学之士，或曾受过良好的国学启蒙教育，都非常注重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治国智慧中吸取营养。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西学中用”、“古为今用”的“中国式/特色”的革命。

传统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观念是“家-国-天下”，天下是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在性的世界体系；大一统是文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延续共同体的统一。传统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秩序是“同心圆”，包括中国中心论、礼法秩序等。传统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方式是内圣外王。

1. 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以德报怨、薄来厚往，体现出古代中国“王道”为主要特点的外交。“王道”又可分为三种：

* **纯粹王道（pure benevolent rule）：**宋、明；孟子的绝对理想主义+道家的与世无争；君子之道、郑和下西洋——理想派；
* **务实王道（pragmatic benevolent rule）：**汉、唐及前清；荀子的相对理想主义+墨子的兼爱、非攻；武力+怀柔——理想派；
* **霸道（despotic rule）：**秦、隋、元；法家，包括兵家与纵横家；反对空谈仁义道德，崇尚实力、暴力、谋略与权术——现实派。

2. 大国气度、信守承诺

中国有大国气度，信守承诺。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中国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援助、对巴勒斯坦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等，都体现了大国担当与道义。

中国是大国，要对人类发展做出贡献。

——毛泽东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国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尽自己所能在资金、物资、医疗、疫苗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与援助。向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为有需要的34个国家派出38支医疗专家组。发挥最大医疗物资产能国优势，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已向69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疫苗援助。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数千亿件抗疫物资，2200多亿只口罩、23亿件防护服、10亿份检测试剂盒。

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习近平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中国不输出革命、不输出饥饿、不卷入战争、不输出难民。中国对自己负责，促进脱贫、温饱、小康。中国对世界负责，为全球事务、全球治理做贡献，如“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共商共建共享、《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中国立场》、《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等。

中国信守承诺。已经签署的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协定等，中国的履约程度、质量名列前茅，如WB&IMF贷款项目优质完成；还贷、脱贫、环保等指数，都提前完成。

3. 不畏强暴、刚柔并济

中国在原则问题（如事关主权领土完整等问题）上，坚持正义、反对霸权。例如，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反对苏联老子党、60年代反帝反修、70年反对霸权、80年代不结盟；21世纪反对美欧“霸凌”打压等。中苏关系改善三条件、中美建交三条件、中国“复关”三原则、气候谈判责任原则、华为Tik Tok等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也都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外交深谙“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艺术，如1999年南斯拉夫北约炸馆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等。

中国外交坚持以我为主，“柔弱胜刚强”。1955年8月1日至1970年2月20日期间，中美之间进行了136次的大使级会谈；中国重返联合国，用了22年；中国复关WTO谈判，用了15年；中美经贸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经过了11轮谈判。

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坚定而超然。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象传》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王毅，2025年2月14日在第61届慕安会“中国专场”上的讲话，引用自金庸《倚天屠龙记》

4. 以和为贵、求同存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是追求中庸、和谐发展的思想。

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

——《周礼》

这一思想在传统外交中表现为“和为贵（harmony is prized）”的理念。2004年中国首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2005年中国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2013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平发展合作共赢；2021《全球发展倡议》、2022《全球安全倡议》、2023《全球文明倡议》也都体现了这一点。1999年“中国威胁论”、2012年“修昔底德陷阱”、2017年“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则是西方政治逻辑和政治经验的结论。

中国外交提倡求同存异、实用主义，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如“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台问题；主张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缓和、解决与日本、南海诸邻国在海洋领土的争端等。

5. 合纵连横与不结盟

国际统一战线、1946年“中间地带思想”、1960年代“两个中间地带理论”、19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及在处理中美苏、中美日等多个三边关系时所体现的政治智慧，都体现了中国在“合纵连横”与不结盟上的智慧。

结盟？“准”结盟？不结盟？经过近现代五次中俄、中苏结盟的教训，1982年不结盟政策，1989年被“孤立”危机的教训，以及冷战后1993始北约推行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之后，在这些诸多选择中，中国最终选择了“伙伴关系”。1998年4月《人民日报》，大国间关系可归纳为3种基本模式，即伙伴关系、结盟关系、非结盟非伙伴关系，中国“伙伴关系”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关系。2014年，中国开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截止2024年2月，与107个国家、地区、组织建立不同类型（9至11种称呼与机制）的伙伴关系。

“结盟”在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经验是“缺失”的。有学者指出，东亚是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非对称和平/秩序，欧洲则是武力竞争基础上的均势。

总之，中国外交的哲学基础自西周起，在春秋、秦汉发展。中国早熟的政治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有经有权、权衡变通、合于大道。这就是“轴心时代”三大哲学根基之一——孔子、老子时代古代中国的实用理性。

（四）“理论合力”

“理论合力”的重要产物之一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为了解决中印、中缅边界的实际问题，其吸取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精华（平等互惠、合作共享），体现了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大小平等，和平共处），包含了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大而不霸、小而不惮）。

另一个“理论合力”的重要产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这一概念最早是为了推动全球化进程而提出来的（2013），吸取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精华（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超越国家、阶级、种族、信仰差异），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和谐天下”思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可见，不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融通了中外古今的外交理念，既是理想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当然，也有实用主义的意味——因此，都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